

■ 古代文史
名著选译丛书

宋
元
明
清

巴蜀书社

译注 郑力民

审阅 宗福邦

元好问诗选译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元好问诗选译

(川) 新登字008号

责任编辑：王大厚

封面题签：启 功

封面设计：陈世五

插 图：余菊儒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元好问诗选译

郑力民 译注

巴蜀书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 8.5 字数132千

1991年10月第一版

1991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0,000册

ISBN7-80523-358-6/Z·28

定 价：140.00元 (第二批50种)

国家教委古籍整理

『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600/10/32



序

《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丛书编委会的同志与众多专家学者通力协作、辛勤耕耘的结果。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漫长的岁月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给人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今天，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整理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典籍，做到汲取精华，剔除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使人们在正确认识民族历史的同时，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陶冶道德情操，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使文明古国的历史遗产得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每个炎黄子孙的责任。而要做到这样，对古籍进行整理与研究是重要的基础工

程。但是，整理与研究古籍仅作标点、校勘、注释、辑佚还不够，还要有今译，使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都愿意去读，都能读懂，以便从中得到教益。

基于以上认识，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于一九八六年五月组成了以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三位同志为主编的《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委会，确定了以全国十八所大学的古籍整理研究所为主力承担这一看似轻易、实则艰巨的今译任务。在第一次编委会议上，拟定了《凡例》、《编写与审稿要求》、《文稿书写格式》和一百余种书目。以每一种书为十万至十五万字计算，这套丛书大约有一千余万字，应该说是一项大工程。经过一年的努力，完成了第一批三十六部书稿的译注任务。在各研究所的专家与所长把关的基础上，于一九八七年五月和七月，先后在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召开了部分编委参加的审稿会，通过了二十五部书稿，作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与广大读者见面的第一批作品。与此同时，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六日，邀请了在京的十几位专家教授与编委会十几位编委一起座谈这套丛书与古籍今译的问题。专家们肯定了今译工作的必要性与深远意义，并以他们数十年的教学科研和创作的经验，说明今译是一项

难度很大的工作，是培养人才，使之打下坚实基本功的一种有效方法，专家们还对《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这对当时的审稿工作和保证《丛书》的质量起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古籍的今注不易，今译更难。没有对作品的深入、透彻的研究，没有准确、通俗、生动的语言表达能力，要想做好今译是不可能的。两年多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在探索古籍的今注、今译的道路上，做了一些工作。这部丛书的出版，是系统今译的开始，说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更可喜的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参加了今注今译工作，为古籍整理增添了新生力量，相信他们会在实践中，在学习，中成长成熟。我希望，这套丛书的编委会和高校各古籍整理研究所要敞开大门，加强同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联系，征求他们和广大读者的意见，并向有真才实学而又适宜做今译工作的专家学者约稿，以提高古籍译注的水平，使《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的第二批、第三批作品的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套以文史为主的大型的古籍名著今译丛书。考虑到普及的需要，考虑到读者的对象，就每一种名著而言，除个别是全译外，绝大多数是选译，即对从该名著中精选出来的部分予以译注。译

文力求准确、通畅，为广大读者打通文字关，以求能读懂报纸的人都能读懂它。我希望这套丛书能成为中小学教师、历史教学的参考书，成为大专院校学生的课外读物，成为广大文史爱好者的良师益友。由于系统的古籍今译工作还刚刚起步，这套丛书定会有不少缺点、错误，也诚恳地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巴蜀书社要我为这套丛书写序，我欣然接受了。我相信这套丛书不仅会使八十年代的人们受益，还将使子孙后代受益，它将对祖国的繁荣昌盛起到点滴的作用。最后借此机会向曾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专家学者和巴蜀书社的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殷切地希望台湾同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和我们一同做好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为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再放异彩而努力！

周 林

一九八七年十月于北京



前 言

元好问是我国文学史上名冠金、元两代诗坛的一颗巨星。在辽、金、元的传统文学受到普遍冷落和忽视的情况下，元好问却以他辉煌的诗歌成就，赢得了人们普遍的推崇。自金、元至今，文学评论家都把他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代宗工”，比之于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其所以如此，最主要的，便是因为元好问的诗歌中强烈地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反映着人民的呼声。

综观元好问的诗歌，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动乱的时代孕育了诗人的诗篇，而诗人的诗篇也反映了动乱的时代。

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金章宗明昌元年

(1190) 出生在太原府忻州秀容县（今山西忻县）。他家是北魏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是累世为宦的书香人家。诗人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十四岁时，投师陵川学者郝天挺门下，学业更有长足的进步。少年时代的元好问，还曾跟随当县令的叔父元格游宦山西、山东、甘肃、陕西等地，饱览了各地名山大川，增长了不少阅历见识，为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金朝立国之后，积极接受中原文明，注意发展社会生产，经过短短几十年，在世宗（1161—1189年在位）、章宗（1190—1208年在位）时，出现了一段短时期的经济文化繁荣局面。在这太平盛世的幻象面前，统治者们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了，贵族子弟们更完全丧失了祖、父辈打天下的雄风，一味游手好闲，骄奢逸乐。厕身于这样一种享乐风气中，年轻的元好问自然也患有一般贵介公子的通病，终日结交诗朋酒友，唯以读书饮酒为乐。虽然酒酣耳热之际，他偶尔也会发一发“或当大猎燕赵间……男儿万马随拗呵”的奇想，或是唱一唱“著鞭忽记刘越石，拔剑起舞鸡鸣歌”（《并州少年行》）的高调，但无论是他的生活还是思想，都离人民和时代远而又远。如果不是时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元好问大概就无声无息地淹没在这种醉生梦死的生活

之中了。

从蒙古高原上刮来的一场风暴，唤醒了诗人的灵魂，激起了诗人的忧愤。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三月，诗人二十一岁时，蒙古成吉思汗誓师南下，发动了历时二十四年的侵金战争。一时间，多少繁华的城市平为废墟，多少无辜的生灵惨遭杀掠。金宣宗贞祐元年（1213）秋，蒙古军沿太行山东麓南进，连破十馀州；随后又绕太行山西麓北上，直取平阳（今山西临汾）、太原（今山西太原），并于二年三月攻破了诗人的家乡忻州，纵火屠城，杀死十馀万人。元好问的长兄元好古也在此时遇害。贞祐四年（1216），蒙古军再破忻州，诗人为避兵祸，举家逃亡到河南福昌三乡镇（在今河南宜阳西），以后又移居登封（今河南登封）。这场杀光、抢光、烧光式的掠夺性战争，给全国人民、也给元好问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和灾难。但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诗人却因了这场灾难，得以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

在战争的开始阶段，也就是诗人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期间，蒙古还没有伐金远图，金朝也还多少保留了国势强盛的幻象。因此，诗人虽然遭受了丧亲之哀、毁家之痛，但总的说来，他对形势趋向的认识还

是很幼稚的，还看不到金朝灭亡的远景，对战乱的忧愤也因而远未达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特别是，他那股实家财虽经兵燹，却未伤根基。早在战乱之前，诗人就预先转移、埋藏了珍宝，直到避兵河南，还用鹿车载书千馀册、画百轴随行，其它随身细软可知。这就使他还有闲心，也有可能是在逃到河南后，营建别业，买田昆阳（今河南叶县），依旧过他那悠游自在的地主生活——或结伴游山，或留连诗酒；或以琴棋书画自娱，或与达官名士联欢。这样的一种生活，与当时一般百姓所蒙受的痛苦实在是相去太远了。因此，诗人心中虽也时时泛起国难家仇的忧愤，但这种忧愤却又显得肤浅和狭窄，而且还往往被花丛柳畔的豪饮轻吟所消溶。反映到诗歌创作上，便导致他作品的基调还只是个人痛苦，摄取的内容也多是个人遭遇，而很少涉及到国家之变和人民灾难，如反映忻州战祸的《石岭关书所见》，对于十馀万人的无辜遇害，只说是“已化虫沙休自叹”。虽也属愤激至极之语，但细细品来，却又不免令人感到，诗人的愤激恐怕主要还是因为战乱使他这幸存者“厌逢豺虎欲安逃”罢了。他虽然也表现了“青云玉立三千丈”的豪气，但很大程度上，却不过是一种贵介子弟的盲目自傲而已。在此同时，贵介子弟的习气，使他有意无意地把视线从黑暗现

实移开，而去谋求“万物寄一壶”的醉乡超脱，或是去欣赏所谓的桃花源。在《阳兴寨》一诗中，诗人在“重岗拥戍城”，人们“年年避营马”的严酷环境中，去表现所谓“山川带淳朴，鸡犬见升平”的桃源境界，令人感到不协调。这一时期诗人写的不少恬淡优美的咏景小诗，也正是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实际。

但是，诗人毕竟处在外患逼迫、内政腐败、天灾频仍、兵燹连年的时代，自己又流落异乡，仕途坎坷。这一切交相煎逼，使他深感世事多变、人生浮幻，从而产生了深重的苦闷。这苦闷是现实社会的产儿，是动乱时代的折射。因此，当他用诗篇来表现个人的痛苦、抒发内心的郁闷时，便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和人民的共同呼声。像《永宁南原秋望》的写怀念故乡：“烽火苦教乡信断，砧心偏与客心期”；《秋怀》的写盼望早日驱除敌寇，重返家园：“何时石岭关头路，一望家山眼暂明”；《怀益之兄》的写干戈满眼，三年流浪：“欲赋穷愁竟不成”等等，便都具有动乱时代的共性，是饱尝乱离之苦的人们的共同心声。尤其可贵的是，诗人在躲避兵燹的过程中，有机会接触了农村生活，从而写出了《驱猪行》、《秋蚕》等抨击苛捐杂税、同情农民疾苦的诗篇。

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至八年（1231），也就是诗人三十七岁至四十二岁这五年间，诗人抱着经世济国的愿望，先后出任镇平（今河南镇平）、内乡（今河南内乡）、南阳（今河南南阳）县令。县令的职责，在当时来说，主要便是替朝廷和军队催租逼赋。这件令诗人大感苦恼的差事却使他有机会进一步深入民间，亲眼看到高达平时三倍多的军租压得“民不堪命，率弃庐田，相继亡去。”（《金史·食货志》）以致桑田荒废，“野无居民”。目睹于此，诗人心情沉重，忧思如焚。他为国运的衰落而忧虑，又为人民的痛苦而伤心，因此，他的诗作便不再局限于表现个人的遭遇和苦闷。在《宿菊潭》一诗中，诗人对饱受豪强欺凌，吏胥骚扰，尤其是军租重压的百姓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表达了希望百姓能够“努力逃寒饥”的心情，同时也抒发了自己作为县令的职责和作为诗人的良心之间的矛盾。《内乡县斋书事》一诗，更把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这里表现的“寸心牢落百忧薰”，已经不是忧个人命运，而是在为无粟佐军、国运难保而忧，为民生凋敝、十室九空而忧。在这样一种广阔的视域中，诗人概括的“饥鼠绕床如欲语，惊鸟啼月不堪闻”的乱世衰国意象，便很能惊人心魄、动人哀思了。

金哀宗正大八年八月，元好问从南阳任上被召为尚书都省掾，移家汴京（今河南开封）。当时，金朝已在该年春天失陷了陕西军事重镇凤翔（今陕西凤翔），在其它战场上也节节败退，蒙古军势如破竹，由金州（今陕西安康）东下，直指汴京。正大九年（1232，也就是天兴元年）正月，蒙古军在钧州（今河南禹州市）三峰山大败金兵，随即长驱直入，两度包围了汴京。诗人入京不久，便陷入绝境，过着“围城十月鬼为邻”（《喜李彦深过聊城》）的生活。到十二月，汴京粮食已尽，瘟疫流行，哀宗被迫率部分人马逃离汴京。当时任左司都事的诗人留守汴京，在围城中亲睹事态的恶性发展，意识到金朝已无法避免覆灭的命运。天兴二年（1233）春，汴京西面元帅崔立发动政变，杀死丞相完颜奴申等留守官员，向蒙古军献城投降。金宗室男女五百余人被虏至青城，全部被杀。元好问则与其他金朝官员一起，被押送到山东聊城（今山东聊城）拘管，尝尽了亡国囚徒的痛苦滋味。此后，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的哀宗政权勉强支撑了几个月。天兴三年正月，蒙古和南宋联军攻破归德，哀宗自杀，金朝灭亡了。

在亡国前后的几年间，是元好问诗歌创作的黄金时代。诗人亲眼看到了侵略者的掠杀暴行和本国

统治者的腐败无能，目睹了王朝的倾覆和人民的劫难，同时自己也备尝亡国奴和阶下囚的苦况。这一切，使诗人悲痛欲绝、激愤如沸。在诗人这一时期的诗歌中，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的激情，表达了国破家亡的哀怨和对人民受难的同情。

在听到凤翔失陷、惨遭屠城的消息后，诗人非常震惊，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有名的丧乱诗《岐阳三首》。诗中愤怒地谴责蒙古军的残暴无道：“偃蹇鲸鲵人海涸，分明蛇犬铁山围。”激烈地指斥这场掠夺性战争：“从谁细向苍苍问，争遣蚩尤作五兵？”对于金朝统治者的防边无策、将帅误国，诗人悲慨地抨击道：“三秦形胜无今古，千里传闻果是非？”“三十六峰长剑在，倚天仙掌惜空闲。”对于惨遭屠杀的人民，诗人哀悼道：“岐阳西望无来信，陇水东流闻哭声。野蔓有情萦战骨，残阳何意照空城？”真是字字痛切，声泪俱下。汴京被围之后，诗人眼看哀宗出逃，亡国在即，而自己又无力回天，不由得兴亡之慨触绪纷来。他绝望地唱道：“惨澹龙蛇日斗争，干戈直欲尽生灵。”“精卫有冤填翰海，包胥无泪哭秦庭。”（《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崔立献城后，诗人身为俘囚。他满怀悲愤地回顾了金朝衰亡的全过程，抒发自己的亡国之慨：“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谓神州遂陆沉。

华表鹤来应有语，铜盘人去亦何心？”（《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此时写下的《俳体雪香亭杂咏》十五首，哀悼金诸王、宗室的遇害，表现亡国遗臣的绝望，读来悲凉凄恻，含意深厚。在被押赴聊城的途中，诗人看到河山破碎，人民受难，又在撕人肺腑的亡国之痛中唱出了绝望的哀歌：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旂车似水流。
红粉哭随回鹮马，为谁一步一回头？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
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

像这类哀愤感人的诗歌，在诗人此时的作品中不在少数。

蒙古太宗七年（1235），诗人被解除了聊城拘管，移居冠氏（今山东冠县），过起了遗民生活。四年后，也就是蒙古太宗十一年（1239），诗人回到了阔别二十四年的家乡秀容读书山下。他立志以保存金朝国史为己任，在家中筑起“野史亭”，着手编撰金代诗歌总集《中州集》和金代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在以后的几年间，诗人为搜集史料，